

Y/T 08/03

李大钊年谱

(1889—1927)

杨树升 张 燕 韩一德

夏自正 黎 典

目 录

1889 年10 月 (一岁)	(1)
1890 年—1894 年 (二——六岁)	(2)
1895 年—1897 年 (七——九岁)	(3)
1898 年—1899 年 (十——十一岁)	(3)
1900 年—1904 年 (十二——十六岁)	(4)
1905 年—1906 年 (十七——十八岁)	(5)
1907 年 (十九岁)	(6)
1908 年—1909 年 (二十——二十一岁)	(6)
1910 年 (二十二岁)	(7)
1911 年 (二十三岁)	(8)
1912 年 (二十四岁)	(9)
1913 年 (二十五岁)	(11)
1914 年 (二十六岁)	(17)
1915 年 (二十七岁)	(19)
1916 年 (二十八岁)	(23)
1917 年 (二十九岁)	(32)
1918 年 (三十岁)	(51)
1919 年 (三十一岁)	(64)
1920 年 (三十二岁)	(94)
1921 年 (三十三岁)	(116)
1922 年 (三十四岁)	(138)
1923 年 (三十五岁)	(158)

1924 年 (三十六岁)	(178)
1925 年 (三十七岁)	(196)
1926 年 (三十八岁)	(217)
1927 年 (三十九岁)	(234)

附一:

公祭仪式	(245)
------	-------

附二:

李大钊著作目录	(248)
---------	-------

1889 年、(一岁)

10月

29日 (阴历十月初六日) 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李大钊乳名憨头, 少年时名耆年, 字寿昌。后来改名大钊, 字守常。

大钊同志的远祖原籍山东, 明朝曾为官,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奉诏移此”。(参见刘荆山《李大钊同志轶事补遗》《乐亭文艺》1979年二期)

父李任荣, 字华亭, 自幼勤读诗书, 知文达理, 写得一手好字。早年患肺病, 1888年5月, 冀东大地震, 因受惊吓病情加剧, 第二年病逝, 终年二十三岁。母亲周氏, 生下他一年多, 因感伤过度逝世。

“在襁褓中, 即失怙恃, 既无兄弟, 又鲜姐妹, 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狱中自述》)这“垂老之祖父”即李如珍。他读过书, 早年在东北开过杂货铺, 家中有田九十亩, 过继侄子李任荣为子。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 到了十八世纪的清朝中

期，已经腐朽不堪。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从此，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祖国的灾难日益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和其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革命运动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斗争精神。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国情，就是大钊同志的童年和他革命一生的活动舞台。

1890年—1894年（二——六岁）

大钊同志幼年，全靠祖父李如珍抚养照料，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祖父对他极疼爱，至四、五岁时，还不放他出去玩，每天带他在院子里种花、浇水、锄草、捉虫，有时还给他唱小曲、讲故事。

五、六岁开始，由祖父教字。用的是一寸见方的生字卡；串门、走亲时，也要他认读和背诵人家门上的对联。祖父对他管教极严，告诫他外出时不准看玩赌博的，更不准打架、骂人，否则要受处罚。这种严格的家教，对大钊同志的成长为人，影响很大。

1895年—1897年（七——九岁）

大钊同志七岁时，祖父把他送到庄西头老谷家私塾，跟单子鳌老先生读书。初入塾学，即跳过“蒙学”阶段，同较大的孩子一块读《四书》。

大钊同志读书，专心致志，才思敏捷，又肯于帮助同学读书破讲，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得老师喜爱，他小时的名字就是由单先生起的。大钊同志对这位幼年的蒙师，十分尊敬。后来大钊同志在北京工作时，还定期给他寄捎书报，关心单先生的进步。每逢假期回家，都要前去看望。

大钊同志在谷家私塾里念了三年书，学业良好，进步极快。单老师提出，他个人的学问已不能满足大钊同志的要求，请其祖父“另请高明”，从此，大钊同志转了学。

1898年—1899年（十——十一岁）

十岁时，按当地早婚的风俗，与本村赵纫兰结婚。

赵纫兰（1882—1933）为人贤惠，待人热诚厚道。在大钊同志求学时期，她在家服侍老人，操持家务，以典当挪借凑钱支持大钊同志上学。1920年随大钊同志迁来北京。从此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大钊同志牺牲后，她又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继承父志的重任。1933年在参加大钊葬礼后不久，含恨逝世，并葬于大钊同志墓旁。

1927年，大钊同志在《狱中自述》中曾两次提到夫人赵纫兰。

“……在永读书二年，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

服侍。不久祖父弃世……”。“……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

大钊同志离开谷家私塾，来赵家，随赵辉斗念书二年。

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附于光绪皇帝的支持发动的一次变法维新运动。由于遭到顽固派的镇压，历经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运动终于失败。

1900年—1904年（十二——十六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提高，1900年，大钊同志又被送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宋举人家跟黄玉堂先生念书。（宋家是当地的名门大家，设有专馆。黄玉堂，乐亭县小圣庙村人，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

大钊同志读书很刻苦，在二十多个同学中，他是拔尖的，很得黄先生的赏识。

这时，大钊同志已经比较注意思索，开始萌发出一种雄心壮志。据老年人话当年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腊月傍年，大家谈论起清朝政府下诏变法，实行“新政”的事来，引起黄先生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当黄老师讲了洪秀全主张妇女同样可以担任各种官职、参加科举考试，废除束缚妇女的恶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事迹时，大钊同志说：“洪秀全的很多主张不是很好吗，为啥还说他造反呢？！”又问黄先生：“太平天国有百万大军，占领了十一个省，怎么失败了呢？”最后他表示：我长大了要效法洪秀全。黄先生当即劝阻说：“汝勿言不能之，言欲求免祸先求慎言。”

“黄先生对李大钊这个得意门生要学洪秀全的事，难以理

解，但铭记在心，以后经常向人学说。”（刘荆山《李大钊同志轶事补遗》）

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五月，运动席卷华北，冀东各地也建立了义和团组织。

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出卖京津周围的军事控制权，在北京设立使馆区等，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之中。

1905年—1906年（十七——十八岁）

1905年“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在那儿我度过两载光阴。”（参见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革命文物》1980年第三期）

大钊同志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中学，课内主要还是念些古文之类的书，但开始接触科学，阅读过康、梁的文章，初步了解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眼界有所开阔。

这期间，正值清王朝复亡前夕，清政府的卖国求存，帝国主义的竞争瓜分，内忧深重，外患紧逼，祖国处在危亡之中。大钊同志痛感于这种“国势”的“陵夷”，怀着一腔“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激情“……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狱中自述》）

1905年8月，革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通过了该会的总章和宣言，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1907年（十九岁）

祖父李如珍逝世。家境日趋破落，大钊同志面临着失学的威胁。这时，井家坨的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去外埠求学。但大钊同志认为他作官的钱来得不正，断然拒绝。

夏

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

“祖父谢世，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当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非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狱中自述》）“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法政学校，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参见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还接触了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民主制度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等。他学习刻苦，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孕育着革命的志向。这是他一生学习求知的重要时期，也是他爱国思想发展的时期。

1908年—1909年（二十——二十一岁）

作《登楼杂感》二首。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大钊同志最早的诗

作。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南方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等惨遭杀害，面对这种国破山河碎的现实，大钊同志“感慨韶华似流水”“青鬓无端欲白头”，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心情很急切。唯恐“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但怎样救国呢？心里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主见。所以不能不自叹“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了。思救家国，而无出路，这使他很苦闷。

1910年（二十二岁）

11月

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宪政。法政学校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为此举行罢课。大钊同志参加了罢课活动。

本月21日 天津《大公报》载“联合进行”报导一文，内有“旅津全国学界请愿国会同志会”，发电全国的电文，原文称：

“……鉴国势危急，非即开国会不能救亡。津全体学界停课，已举代表晋京请愿，特电贵省速起以为后援……”

又、云南、贵州、四川、新疆、甘肃、五省路远山遥，不能举代表联合，另发长电一道，原文是：

“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鉴东三省危甚，非即开国会莫救，奉津学界因请愿断指割臂者数十人，热血奋飞，感痛何似！现已一律罢课，一面求准督宪代奏，一面举代表晋京请愿，并组成同志会以为后盾，希转各界举代表晋京合作，乞明年召集至盼。

在津全国学界请愿国会同志会”

本月23日,《大公报》又载“请愿风潮略平消息”,内称“闻日前督宪陈制军,对于在津全体学界请愿国会之风潮,曾下一札,严斥巡警道无能,札中有‘行同聋聩,事前不能预防,事后又不能解散’等语。该道因两面不得讨好,已决意辞职。”

对这次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的罢课活动,大钊同志的老师白毓昆(字亚雨)认为: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要变法、维新、立宪,都是不可能的;请求清政府开国会,只是“与虎谋皮”。大钊同志对白毓昆老师的政见十分赞同。(白曾在上海参加同盟会,为开展北方革命工作,来天津在北洋法政学校和女子师范担任教员,是京、津、保同盟会重要领导成员。)

大钊同志对白毓昆老师非常尊重,课后常和同学一起邀请白老师讲评历史掌故,师生融融一堂,直至深夜。白毓昆老师对这位勤奋有为的学生,特别器重,有意安排他参加一些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参见1980年第四期《革命文物》《李大钊的老师——白毓昆烈士》)

1911年(二十三岁)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大钊同志最初对这场革命寄予极大的希望。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成果,政局逆转直下。大钊同志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

本年,作《哭蒋卫平》七律二首。

(蒋卫平,是爱国志士,大钊同志的好友。约在1910年在

东北渡河时遭反动派暗算牺牲。)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哭诉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先烈。另一首《题蒋卫平遗象》大约也作于这年。诗沉痛悼念牺牲的亡友，抒发了悲壮的情怀。

本年春，清政府为挽救垂死的命运，决定这年秋季在永平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以白毓昆为首的革命党人得知消息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策动在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待命的新军届时起义。他和一些同志打入滦州、永平一带的新军中去工作，奔走于京、津、张家口等地推动起义工作的开展。

9月18日，天津《大公报》载“立宪军成立”消息。

“探闻驻滦州之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于昨15日早八时在滦州迤北玉皇山庙内，召集全军官弁勇丁开大会，换白旗中红线一道，命名为立宪军。”

1912年（二十四岁）

6月

写《隐忧篇》，发表于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三期上，署名李钊。大钊同志原热望辛亥革命能够“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但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紧步胜利之后，到来的是袁世凯的窃权。多灾多难的祖国如同“敝舟深泛溟洋……固犹在惶恐滩中。”接着指出：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六忧。

冬

去北京。应孙洪伊之约，和白坚武筹办《言治》月刊。在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发生交往，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参见曹绶之、曹嘉荫：《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件存北京市档案馆）

年底，陈翼龙、曹嘉荫到天津组织建立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

冬末

作《岁晚寄友》五律诗二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江山虽“依旧”，但“风景已全非”，国家发生了沧桑之变，诗句流露着欢快之情。“慷慨思投笔”但又“艰难未去师”，同时也含有内心的隐忧。

本年1月1日 南京组织了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3日 滦州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王金铭为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部部长并暂兼外交部长。4日，革命军举行誓师，宣告独立，并发布檄文，声讨祸国殃民的清廷，号召同胞们群起杀敌，光复河山。

5日 滦州起义失败。白毓昆英勇牺牲。

3月10日 天津《大公报》载“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广告”：

“顷准学务公所函称，因津埠猝遇变乱，学堂应暂缓开学等因，所有本堂前次广告应暂行取消，一俟时局安全开学有期，再行登报通知，此布”

3月21日 《大公报》又载“追悼会将开”消息：

“中华民国同盟会诸君，发起追悼北方死难诸烈士，订三月二十四日假李公祠为会场。

烈士姓名

滦州：大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总参谋白毓昆（白亚雨）……”

1913年（二十五岁）

2 月

12 日 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成立时，天津警察所奉冯国璋之命加以阻止。大钊同志急来京，商量对策，终于托关敬恒向赵秉钧说明后，才得以成立。（参见曹绶之、曹嘉荫《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

4 月

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

“他早期的论文，是发表在《言治杂志》上……开始是月刊，后改为季刊；中间还曾经因为嫌每月出版一期太慢，与在北京的同人合办过一个《法言报》……《言治月刊》出版了六期以后，改办《法言报》，大钊同志仍然是一个热心的参加者，而他这时发表的文章，郁癸先生说它是‘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汨汨，所以箴贬瞶蒙，鼓舞群伦者。’……可惜他在《法言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过……”（参见贾芝“《李大钊诗文选集》后记”）

1日 在《言治》创刊号上，发表《大哀篇》，署名李钊。

大钊同志以痛切难抑的感情，抨击了卖国贼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表达了对祖国人民仍然蒙受苦难的深切关注。文章指出，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窃权卖国，“击柱论功于灿然国徽下矣。”他们敲榨民脂民膏，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而对人民却“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载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同期，还发表《弹劾用语之解纷》一文，署名李钊。

又，发表《筑声剑影楼纪丛——朱舜水之海天鸿爪》，署名李钊。

这是大钊同志编述的明末爱国志士朱舜水客死日本的事迹。文章赞扬朱舜水的爱国思想，义风刚志，叙述了他与日人的交往，晚年的壮心，所留的遗物等，“拾零存遗”不失点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朱舜水的敬仰之情。

又，发表《更名龟年小启》，署名李钊。借“更名龟年”的“小启”，评述了卖国贼袁世凯独裁专权后的黑暗现实——“暴君歇，而暴民兴，天祸殷，而人祸极”，“盛世难期”，封建皇帝虽被赶下台，而中国人民仍然当牛作马，“而今而后，化猿化鹤尚不可知，则呼马呼牛亦惟漫应而已。”

5月

1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二期上发表《暗杀与群德》一文，署名李钊。

又于同期发表《复景学铃君》，署名李钊。他以《言治》记者的身份复景学铃关于“征求朱舜水先生著作及手迹”的来函。

在复信中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城，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已。……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神州光复，未有祭告，以慰英魂，而樱花三岛间，迺于去复举行舜水二百五十年纪念祭典，倾闻之下，欣痛交集，时披阅东报，见其关于先生轶事遗闻之记述，辄为译辑……陆续载之本报，以供众览，阐出存轶之责非所敢辞焉。”

又于同期发表《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主要介绍当时日本举行舜水祭典之时，考古学者辩论和质疑的一些情况。

6 月

1 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三期上发表《裁都督横议》一文，署名李钊。这是针对“暴泪恣睢，飞扬跋扈”的都督而发的。本文论述了裁都督之必要、时机和办法，以及善后等几个问题。大钊同志认为，解除军法，拥护宪法，巩固国权，伸张民权，整顿吏治，都不可不裁都督。

又于同期发表《论民权之旁落》，署名李钊。袁世凯窃居大总统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实行个人独裁，打击革命力量。于 3 月 15 日，指使其内阁总理赵秉钧，在沪宁车站暗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接着又向英、法、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善后”大借款，以扩充反动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指出：阴谋盗窃民权的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暗杀”与“借款”造成了中国“危机万状”，民权“旁落”，“民生益沦于涂炭”。

7、8 月间

大钊同志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去北京。

他在用英文写的《自传》中说：“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法政学校，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

“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恰好在这时，我的朋友要我到东京来与他们一起继续我们的学业。”（引自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三期十八页）

8月 社会党人陈翼龙在京被杀。这时，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也陷失败。时局的黑暗，使大钊同志极为愤慨和痛心。他迫切地期望找到一条拯救革命的出路。

9 月

1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年第四期上发表《原杀——暗杀与自杀》、《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等文章。均署名李大钊。

月初 离北京，返回故乡，筹划出国去日本。他携同学子默来到昌黎县的碣石山作旧地重游。这次重游，有和祖国暂时作别的深意。他们游遍了五峰山和附近各处，看了那里的名胜和秋景，特别看了水帘寺和玉液池，看了一些名人留下的诗文和刻石，抄了水帘歌和其他的诗，从碑文上研究了明末范志元将军扼守昌黎，抵抗清兵入侵的历史，还向当地群众了解了当年百姓坚守昌黎城的英勇事迹。

这期间，他留下子默在昌黎，自己回到大黑坨村家中小住，